論　著

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 *

連　玲　玲**

摘　要

本文檢視孤島時期上海出版的婦女刊物，探討在戰爭氛圍下，婦女文化建構的過程。受到女性主義文化理論影響，歷史學家開始傾聽婦女的聲音，特別注意到藉由文字或藝術形式所形構的姐妹情誼。這種婦女文化通常被視爲一種獨特的性別認同主張。儘管近代以來救國論述極爲盛行，也成了形塑婦女文化的力量，但其再現方式卻因期刊性質各有不同。本文觀察不同種類期刊，並分析三種戰時的女性形象：女英雄、受害者、外國他者，討論知識婦女以何種方式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並協商國家認同及性別認同之間

---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抗戰時期的婦女職業」(NSC96-2411-H-001-011-MY3)的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10 至 11 日），承蒙評論人姜進教授、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謹申謝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界線。

關鍵詞：婦女期刊、上海、抗戰、女英雄、性暴力、跨國婦女文化

婦女史的發展歷程中，「婦女文化」的發現是一大關鍵。和極力消弭性別差異的「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不同，「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學者承認婦女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受到的性別角色限制，同時也注意到傳統的文化研究並未正視婦女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因而主張研究婦女的生命經驗及表達方式，以平衡男性爲主的單一性別視角的世界觀，並促進更多元的價值體系。[1] 受到女性主義文化理論的影響，歷史學者開始聆聽婦女的聲音，特別注意藉由文字或藝術形式所締結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在中國史方面，明清的「閨秀文化」尤其受到重視 —— 精英婦女透過詩文的創作與交換，把生活空間及關係網絡延伸到家庭之外，形構一個不同於男性知識份子以科考晉身爲基礎的女性社群。「女性書寫」的大量出現，不但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也爲中國文學史另立脈絡，「婦女文化」儼然成形。[2]

19 世紀中葉以來，報紙期刊成爲大眾文化的展演場域，婦女文化亦在此獲得新的舞台。此處的「新」，至少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相較於明清才女的詩文集，近代報刊是較容易接觸的知識媒介，不但售價較爲低廉，可以吸引較多讀者，出版門檻也低，略通文字者即可投稿發表議論，也因此相對於明清婦女文化的「精英」氣息，近代報刊所呈現的婦女文化便顯得「平民化」得多。其次，明清才女的書寫內容以個人情感

---

1 Gayle Kimball, “Women’s Culture: Themes and Images,” in Gayle Kimball, ed., *Women’s Culture: The Women’s Renaissance of the Seventies* (Metuchen, N. J.: The Scarecrow Press, 1981), pp. 2-5.

2 關於明清婦女文化的著作甚多，該領域的研究概況可參閱：林麗月，〈從性別發現傳統：明代婦女史研究的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1-26；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 —— 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27-63；Gail Hershatter,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抒發及周遭人事見聞為主；時至近代，隨著女子入學及就業的機會增多，自主意識高漲，知識婦女也開始參與公共議題的論辯，使婦女文化走向「公共化」，甚至某些私密情事（如女性身體及情欲），還成為報刊上的熱門話題。

婦女文化的平民化與公共化，使某些「男性」(masculine)課題成為女性書寫的重點，其中「救國」可說是婦女期刊的基調 —— 事實上這也不限於婦女期刊；現代報刊在中國發展之初，即帶有強烈的「啓蒙」色彩，主事者經常利用報刊宣傳新知、開啓民智，期以拯救岌岌可危的國家。晚清以來婦女期刊則經常將婦女地位與國家民族的命運連繫在一起，認為婦女有義務關心國家前途，甚至國家民族的解放是婦女追求獨立自主的前提。本文即討論在「男性話語」的框架下，婦女文化的塑造過程，特別把焦點放在抗戰時期上海的婦女期刊。儘管國家當局把抗日戰爭定調為「全面戰爭」，也就是「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地全面性總動員，戰時性別分工仍十分明顯：男性在前方殺敵，女性在後方抗敵，前者主動出擊，後者待命支援，這種性別角色的論述也就理所當然地把戰爭建構為「男性」領域，研究者更將軍隊及戰場視為培養「男性氣概」(manhood)的最佳場域。[3]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氣概」不僅是用來定義男性的氣質，也對於婦女文化造成影響。過去學者多半把婦女文化視為姐妹情誼的表達，是以「性別隔離」(gender separatist)為思考模式的認同形構。研究戰時上海文學的黃心村(Nicole Huang)便認為，日軍全面佔領上海後，文壇出現一批新生代女作家，完全避開大時代的烽火戰亂，專擅書寫兒女情愛；她們之所以能夠在上海生存，不但因為在日僞高壓統治下，唯有這些「非關國家政治」的主題才允許流通，也因為拒當「漢奸文人」的男作家，不是遠赴後方另闢天地，就是消聲匿跡地隱寓於上海里弄之間，結果為女作家留下施展實力的空間，進而創造出戰時的婦女文化。[4] 然而婦女文化並非發展於性別權力眞空的狀態，縱

3 王詩穎，《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臺北：國史館，2011）。

4 Nicole Huang,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然不利的政治環境削弱男性文人的創作餘裕，戰爭所形塑的價值觀仍然呈現男性霸權；在男性主導的戰爭氛圍下，知識婦女如何形塑婦女文化？它又如何影響婦女的自我認同？這是探討戰時婦女文化所無可迴避的課題。

爲了較全面地考察戰爭對婦女文化的影響，本文先鳥瞰式地介紹上海所出版的婦女期刊；限於篇幅及資料可得性（部分刊物佚失，只知其名而不見內容），筆者無法一一考察所有刊物，因而採取類型學的做法，就主編所揭示的出版宗旨將婦女期刊初步分類，並自各類別選取樣本，進行背景及文本分析，特別注意戰時的女性形象。本文把重點放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孤島」時期(1937-1941)，一方面由於現有少數關於戰時婦女期刊的研究，僅述及日佔時期；[5] 另一方面，由於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存在，爲中日開戰後的上海留下一處相對安全的「避難所」，此間文人雖仍有所忌憚、無法暢所欲言，但言論尺度較日軍佔領時期大得多，因此較能清楚地看出戰爭前後婦女形象的塑造及轉變過程。傳統中國婦女的典範形象均以「關係性角色」呈現，最典型的是「三從」論述，女性認同必須憑藉與男性宗族的關係找到依歸；近代以後，「新女性」的出現與定型，個人性的獨立自主才成爲新的認同架構，[6] 因此近代中國女性形象的研究多將焦點放在「新女性」及其變形（如「摩登女郎」）之上。[7] 本文則著重戰爭在女性形象塑造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女英雄」及「受害者」的建構：什麼樣的女性被稱爲「英雄」？她們與過去的女性典範形象有何異同？作者又如何述說「受害者」的故事？有趣的是，期刊作者也經常介紹外國婦女在戰爭中的角色及處境，

the 1940s (Leiden: Brill, 2005).

5 前述黃心村的研究主要研究日佔時期走紅的女作家蘇青、張愛玲等人的作品，中國大陸新近出版兩本關於婦女期刊的著作亦忽略孤島時期。參閱：李曉紅，《女性的聲音：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女性與大眾傳媒》（上海：學林，2008）；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6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2.

7 關於「新女性」的研究，可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正可作為中國婦女的對照，因此本文也列入討論。透過考察戰時婦女期刊，本文希望探討知識婦女對戰爭的認識與態度，進一步思考戰爭與婦女的關係。

孤島時期婦女刊物鳥瞰

中國第一份婦女報刊是 1898 年在上海創刊的《女學報》，為中國最早的婦女團體「女學會」的機關報，主筆者多為晚清改革者之女眷，如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梁啓超的妻子李蕙仙、陳季同的弟媳薛紹徽等人均是。[8] 該刊以宣揚維新變法、提倡女學、爭取男女平權為主要宗旨。此後開啓婦女刊物的熱潮，根據徐楚影、焦立芝的統計，1898 至 1949 年間，中文婦女期刊多達 600 餘種，且集中於上海。以晚清為例，辛亥革命前所出版的婦女刊物有 26 種，在上海創刊者約占半數；直到中共建政前，上海一直居於中國出版中心的地位。[9]

婦女期刊通常抱持著「喚醒女同胞」、「為婦女發聲」的使命，但它們並不全然是婦女的產物。根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所收集的資料，民國時期上海共出版 171 種婦女期刊，其中可辨識主編性別者有 63 種，男性及女性主編者分別為 23 及 36 種，其中有 4 種同時以男性及女性擔任主編。儘管以上數字無法真正反映婦女期刊主編的性別比例（主要因為許多刊物以出版社或報刊社為主編），但男性參與婦女期刊編輯的情形，可謂相當普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峰期間最著名的幾份刊物如《婦女雜誌》、《婦女評論》、《新女性》等，均為男性知識份子所創辦。隨著女子教育的發展，愈來愈多知識婦女投入出版界，並且開始掌握婦女議題的發言權。其結果之一是，1930 年代發刊較久、影響力較大的婦女期刊如《婦女共鳴》、《女子月刊》、《女聲》、《婦女生

8 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現代中文學刊》，期 1(2012)，頁 26-27。

9 徐楚影、焦立芝，〈中國近代婦女期刊簡介（一八九八－一九一八年）〉，收入丁守和編，《辛亥時期期刊介紹》，集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680-683。

活》等，皆由女性主編；而轟動一時的「婦女回家」論辯，主事者亦多爲知識婦女。

1937 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同年 11 月國軍西撤，上海華界爲日軍占領，不少報刊被迫停刊或移地出版，如最具指標性的《申報》於 1937 年 12 月將發行部移至漢口、香港等地，直到 1938 年 10 月才重新在上海租界復刊。許多婦女刊物由於沒有像《申報》那樣的奧援，當戰火一點燃，便宣告夭折。日軍對於輿論的嚴密控管，宣稱中立的租界政府亦對反日、抗日言論高度敏感，使得報人如鯁在喉，有志難伸。因此，不少文化人抱怨孤島的「空氣沈悶」，沒有「精神食糧」可供滋養。[10] 即便如此，知識婦女仍努力耕耘這塊文化園地。根據圖 1 所示，[11] 1920 至 1930 年代是婦女期刊發行的黃金時代，共有近 90 種新期刊出版。令人驚訝的是，抗戰八年期間，新發行的婦女期刊亦達 30 種之多；仔細分析，這些刊物主要發行於太平洋戰爭之前，換言之，孤島時期的出版業並不如許多人所評論的「消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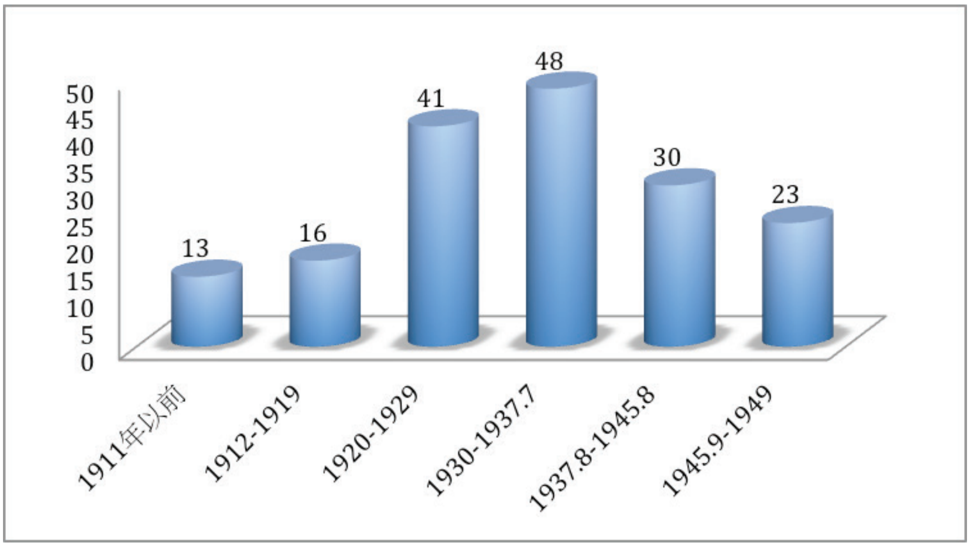
圖 1 所示是抗戰時期上海新發行的婦女期刊的統計，但有些孤島時期的刊物乃延續自戰前。爲清楚觀察整體的出版狀況，特將孤島時期出現過的 33 種婦女期刊名稱、起迄年代及主編等訊息列於表 1。根據刊名及發行宗旨，大致可以將這些期刊分爲四大類：一是宣傳抗日，如《戰時婦女》、《孤島婦女》、《上海婦女》等；二是改善家庭生活，如《理想家庭》、《婦女與兒童》、《慈儉婦女》等；三是維護婦女權益，如《中國婦女》、《婦女界》、《職業婦女》等；四是女校或婦女團體的機關報，如《上海女青年》、《上海女子大中小學校刊》、《職婦》等。

10 例如永安公司祕書鄭留，便感嘆抗戰爆發後出版界的凋零，因而自告奮勇，以永安公司為名，編輯綜合性雜誌《永安月刊》。

11 本圖根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所編的《上海婦女志》統計繪製而得，不過該志的數字並不準確，例如 1914 年王文濡所主編的《香豔雜誌》定期刊佈女界新聞，且登載知識婦女的作品，應可算為「婦女刊物」；1940 年代知名女作家蘇青所編的《天地》亦多攸關婦女文學，但《上海婦女志》均未列入統計，卻將男作家周瘦鵑所辦的文藝期刊《紫羅蘭》納入計算。本圖依《上海婦女志》計算，僅以官方資料作為觀察趨勢的基準點，並非為提供精確統計。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分類僅提供粗略的範圍，事實上各個類別間的界線並不全然如此明顯。例如，具有濃厚抗日色彩的《上海婦女》，爲了迎合家庭婦女的需求，特設「家事顧問」、「育兒常識」等專欄；主張女權、宣稱具「戰鬥性」的《中國婦女》也刊登〈科學發明與家庭的改造〉之類的文章；而職婦俱樂部的會刊《職婦》除了會務報導，也有不少女權議題的討論。[12] 由於機關刊物以特定機構的事務性內容爲主，以下僅就前三類期刊加以分析。

圖 1　近代上海發行的婦女期刊數



資料來源：上海婦女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婦女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 488-501。

12 關於《職婦》的討論，可參考 Ling-ling Lien, "Leisure, Patriotism and Identity: The Chinese Career Women's Club in Wartime Shanghai," in Peter Zarrow, ed.,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pp. 213-240.

表 1　孤島時期上海的婦女期刊

刊　　名	發行期間	主　　編	備　　　　註
女鐸報	1912.4-1949.12	上海廣學會	後改為女鐸：家庭月刊。1942.5-1944.6 停刊
節制月刊	1922.3-1932.6	中華婦女節制協會	1939 年 3 月復刊
女星	1932.1-1941.5	薄玉珍、王敏學	
婦女生活	1935.7-1937.11	曹孟君	1937 年 8 月以後與世界知識等合為聯合旬刊，11 月以後遷至漢口、重慶出版
小姐	1936.7-1940.12	江棟良、羅路	1937.8-1940.7 停刊
婦光	1937		
現代家庭	1937.1-1941.11	李士英、蕭蕭	
家庭良友	1937.2-1940.1	家庭良友社	
女學生	1937.1-1942		
健康家庭	1939.4-1944.9	潘仰堯、梅馥	
家庭	1937.6-1949	徐百益	
戰時婦女	1937.9-1937.11	上海戰時婦女社	
女兵	1937.10	復旦大學	
婦女與家庭	1938.1		
上海婦女	1938.4-1940.6	蔣逸霄、姜平	
婦女半月刊	1938.5-1938.9	婦女半月刊社	
孤島婦女	1938.6-1939.2	顧南琳	
上海女子大中小學校刊	1938.8-1939.1		
職業婦女	1939.3	杜君慧	
婦女文獻	1939.4-1939.5	上海文獻社	
海關婦聯年刊	1939.5	上海海關婦女聯誼社	
家庭與婦女	1939.9-1941.1	王培真、龔月雯、丁禾菲	
中國婦女	1939.12-1945	濮大江、朱素萼（復刊）	1941 年底停刊，1945 年 12 月復刊

刊　　名	發行期間	主　　編	備　　　　註
慈儉婦女	1940.1-1942.12	上海中國婦女慈儉學會	1940 年 1-2 月在上海出版，後停刊，1941 年 1 月在南京復刊
上海女青年	1940.3-1940.5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	
婦女界	1940.3-1941.11	蔡魯依	
大地女兒	1940.7-1940.12	王丹	
新女性	1940.11-1941.4	王公望	
木蘭月刊	1940.12-1941.5	木蘭月刊社	
中國女醫	1941	中國女醫雜誌社	
婦女週報	1941.7	周澎	
婦嬰衛生	1941.11-1949.12	婦嬰衛生雜誌社	1942 年停刊，1945 年 12 月復刊
時代婦女	1941.12	時代婦女月刊社	

資料來源：上海婦女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婦女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王樹槐、成露茜、呂芳上、曼素恩、張瑞德、游鑑明、鮑家麟主編，《海內外圖書館收藏有關婦女研究中文期刊聯合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齊文穎，《中華婦女文獻縱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http://www.cnbksy.cn/shlib_tsdc/simpleSearch.do（2012 年 10 月 22 日搜尋）。

以宣傳抗日、動員婦女爲宗旨的婦女期刊，不少主編的政治立場偏左，有些甚至是中共黨員。1937 年 9 月 5 日創刊的《戰時婦女》旬刊，編輯委員包括胡蘭畦、蔣逸霄、梁光、歌三、王汝琪、郁風等人，其中胡蘭畦(1901-1994)早年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參加北伐，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抗戰期間組織「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從事宣傳教育及戰地救護工作。王汝琪(1912-1990)自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在濟南執教，抗戰期間擔任「上海婦女界抗日救國會」的宣傳部長，

於 1938 年 11 月加入共產黨。至於郁達夫的姪女郁風(1916-2007)雖無黨派背景，但抗戰期間亦加入救亡運動，並追隨郭沫若及夏衍赴廣州辦《救亡日報》。至於孤島時期相當有影響力的《上海婦女》半月刊，創立於 1938 年 4 月 20 日，主編蔣逸霄，[13] 南開大學化學系畢業後，曾擔任中學教員，後轉往報界發展，在天津《大公報》主編「家庭與婦女」副刊，1936 年調滬任《大公報》上海版的「本市新聞」編輯。現存蔣逸霄的生平資料甚少，但從她做的「津市職業的婦女生活」及「上海職業婦女訪問記」兩次專題報導可以看出，她對婦女就業、乃至廣泛的婦女權益問題，極爲關切。[14] 限於資料，我們無法確定蔣逸霄本人的政黨立場，不過從作者可以看出，《上海婦女》也屬於左派刊物：最常在該刊供稿者包括姜平、朱文央、許廣平、夏螢、黃碧遙等，均爲共產黨員或親共人士。因此，《戰時婦女》與《上海婦女》不但均帶有強烈的左傾色彩，從兩份刊物作者的重疊性，也可推論後者爲前者的延續。

除了中共地下黨之外，其它政治傾向的知識婦女也參與抗日宣傳的行列，《孤島婦女》即爲一例。根據《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所記載，該刊創刊於 1938 年 6 月，原訂半月刊，但該館僅存 4 期，

13 根據一些回憶資料，除了蔣逸霄外，《上海婦女》的編輯還包括關露、許廣平等人。依編者所述，該刊乃由「編輯委員會」決定刊登的文章，因此關露等人的確可能參與編務。蕭陽，〈關露在孤島〉，《社會科學》，期 5(1983)，頁 78。不過蕭陽的回憶錄把刊登關露作品〈新舊時代〉的刊物《上海婦女》誤植為《婦女生活》，因此關露等人是否為《上海婦女》的編輯，仍待進一步確認。關於《上海婦女》的相關研究，參閱 Susan Glosser, "'Women's Culture of Resistance': An Ordinary Response to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02-324.

14 關於蔣逸霄的生平，見於天津《大公報》的〈本報記者的自敍記〉（1930 年 11 月 10 日、11 日、13 日、14 日）及《婦女生活》的〈女記者蔣逸霄訪問記〉（1937 年 2 月）。關於蔣逸霄的研究，參閱侯杰、曾秋云，〈《大公報》女記者蔣逸霄與二十世紀早期天津女性採訪：有關〈津市職業的婦女生活〉的史料分析〉，《婦研縱横》，期 76（2005 年 10 月），頁 74-100；侯杰、李釗，〈《大公報》女記者蔣逸霄與二十世紀中期上海女性：「上海職業婦女訪問記」史料介紹〉，《婦研縱横》，期 78（2006 年 4 月），頁 50-83。

第 2 期尚能如期於 7 月 1 日出刊，第 3 期便延至 8 月 1 日，而第 4 期則出版於 1939 年 1 月。主編顧南琳，其生平資料完全付之闕如；然而從僅見的幾篇文章中可看出，比起《戰時婦女》及《上海婦女》，《孤島婦女》更積極向國民黨靠攏，不但主動回應蔣委員長及蔣夫人的演說，鼓吹上海婦女在三民主義的號召下團結起來，也轉載周佛海的〈愈戰愈強的必要條件〉。儘管該刊也介紹蘇聯婦女地位及陝北女戰士群像，甚至刊登鄧穎超的〈陝甘寧邊區婦運〔姿態〕〉一文，但該刊把鄧穎超和蔡暢定位爲「國民黨的忠實黨員」，[15] 本來從國共聯合戰線的角度，這種說法固然無可厚非，但也清楚表示該刊偏國民黨的政治立場。

第二類以改善家庭生活爲宗旨的期刊，主要是戰前「家庭改良運動」的延續。晚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注意到中國家庭制度的問題，其中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廢除大家庭」論述最爲激烈，論者把數代同堂的「大家庭」視爲「封建落伍」的文化象徵，也與君主集權的專制政治相比擬，主張建立小家庭，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家庭的權力結構。[16] 與此同時，另有論者則認爲應從物質生活及家庭關係等方面著手，試圖建立「現代家庭」的典型。1937 年上海曾出現兩份相關期刊《現代家庭》(*Modern Home*)及《家庭》(*Happy Home*)，均因抗戰軍興而告停，待時局穩定後相繼復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者畫下休止符，後者則中斷一年後，接續舊有卷期號數，重新面世，直到 1949 年；和其它旋起旋滅的期刊相比，這兩份期刊可謂異數。[17] 這類刊物的主編，多半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或政治經歷，只是一般的知識婦女。例如《現代家庭》的創辦人兼首任編輯李士英，被評價爲「靜默寡言，勤儉誠樸，有舊文學而無舊腦筋，有新思想而無新惡習。對於處理家事，有條不紊，教導子女，

---

15 史莉，〈陝北女戰士群像〉，《孤島婦女》，卷 1 期 2（1938 年 7 月 1 日），頁 12。

16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家庭問題的討論，1915-1923〉，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901-919。

17 這兩份期刊均創刊於抗戰爆發前，因此未列入表 1；但它們主要的發行期均為戰爭時期。

訓悔〔誨〕有方，詢近代之賢妻良母也。」[18] 由於我們並未能見到李女士所編的刊物，難以評判其工作能力，但李女士過世時《現代家庭》所刊登的悼文中，強調她的治家能力，深具以其作爲賢妻良母典範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似乎較願意參與這類婦女期刊，例如發行長達 10 年的《家庭》月刊，主編徐百益(1911-1998)，是中國廣告界的先驅，曾服務於聯合廣告顧問社，後自創廣告公司，並發行《家庭》雜誌。除他本人外，長期供稿者還包括朱博泉、余天希、胡山源等男性知識份子。而前述的《現代家庭》也起用筆名「蕭蕭」的男性文人擔任編輯，作者更不乏爲人所熟知的男作家如鄭逸梅、天虛我生等；更有趣的是，某些男作者還涉獵相當「女性」的主題，如「家務管理法」、「鹽在家庭中的功用」、「烹飪須知」等。一方面這承襲晚清民初以來男性文人對於女性議題的主導地位，往往以「啓蒙者」之姿訓誡女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男性文人對於女權發展的焦慮。《上海婦女》的作者黃碧遙曾在一篇檢討婦女刊物的文章上，批評《現代家庭》、《家庭》等刊「僅以家事爲滿足」，認爲這些刊物應該承擔更多的「文化使命」，提供新知識的精神食糧給家庭婦女。[19] 這篇評論一出，立即引來《現代家庭》主編的辯駁，並重申該刊的使命：

> 為了看到近代一般婦女，智識的水準，果然已比以前升高到相當的階段，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與男子並駕齊驅，可惜有不少的婦女，因為已走入職業圈內，當然缺少家政實習的機會，更有些是所謂摩登人物，逛舞場，碰麻雀，絕沒有處理家庭的能力，假使一個主婦有了上述的情形，一定沒有美滿家庭的產生。所以本刊始終是多刊載些家事的文章，希望在這幾篇文章中，多產生出幾個賢良的主婦，造成幾個美滿的家庭，從「家齊國治」古人給予我們的昭示中，健全我們

18 〈本刊創辦人李士英女士逝世〉，《現代家庭》，期 9-10（1938 年 5 月），無頁碼。

19 碧遙，〈一年來上海婦女讀物總檢討〉，《上海婦女》，卷 2 期 6（1939 年 1 月 5 日），頁 4。

中華民族。以上就是本刊所負的使命。[20]

從這篇宣言可以看出，主編對於婦女接受新式教育後忽略家庭責任的現象，十分憂心，因而希望藉著介紹治家知識，建立美滿家庭，達成齊家治國的使命。

第三類婦女刊物既不強調婦女的抗日責任，也不要求婦女做現代家庭的守護者，而把焦點放在婦女自身權益及能力發展上，其中以《婦女界》的「個人主義」色彩最爲鮮明。該刊創刊於 1940 年 3 月 15 日，由五洲書報社出版，主編蔡魯依。現存資料並沒有關於蔡魯依的介紹，因此她的出身背景仍撲朔迷離。本刊上的作者也多半名不見經傳，因此我們很難看出這份刊物與上海文化界的關連性。特別値得一提的是，相較於《上海婦女》以少數幾位作者爲稿源，《婦女界》似乎更願意接納外稿 —— 這可以從該刊經常提醒作者前來領取稿酬的公開啓事看出來。然而在《魯迅與我七十年》的序文中，作家王元化曾提到抗戰時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刊物《婦女界》，主要負責人是魯迅之妻許廣平；中共地下黨本來派戴平萬指導該刊編務，後來戴平萬另有任務，便由王元化接手。[21] 雖然這段回憶可能有助於解開《婦女界》的身世之謎，但王元化所說的是時間是 1939 年，而非該刊面世的 1940 年，且當時有其它報刊亦名爲《婦女界》，因此尙無法完全斷定王元化所指導、許廣平所負責的《婦女界》即「蔡魯依」所主編的《婦女界》。不過 3 卷 9 期及 10 期連續刊登《魯迅三十年集》的全頁廣告，並提供讀者預約折扣，似乎暗示了《婦女界》與許廣平有某種程度的聯繫。

不論《婦女界》是否爲共產黨所扶植的刊物，從內容來看，它代表職業婦女的立場的確十分鮮明。在發刊詞裡近乎口號式的宣言將之表現無遺：

「要前進！再不能遲緩」
來吧！已踏進社會的職業姐妹！
和準備步入社會的家庭姐妹！

20　〈編輯室〉，《現代家庭》，卷 2 期 8（1939 年 2 月），頁 24。

21　周海嬰，〈序〉，《魯迅與我七十年》（臺北：聯經，2002），頁 3。

趁著全世界婦女生日的「三八」節
創造起我們的新生命，開闢起我們的新園地，在這裡，我們
要提倡婦女職業，別再讓人叫我們寄生蟲！
我們要努力學習技能，多多增進點知識，別再讓人說：「女
人沒有用！」[22]

基本上，《婦女界》的宗旨承襲五四女權運動以來的論調，希望提高婦女地位，選擇三八婦女節出版，即突顯此一目標。不過相較於對「封建禮教」及父權主義的大力抨擊，發刊詞完全將矛頭指向婦女本身，要求她們反躬自省，「是應該趕上前去，還是該懶洋洋地站著旁觀？」「有沒有夠豐富的學問和技能？」「有沒有足夠崇高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地位？」同時要「提倡高尚娛樂，革除靡費無聊消遣，實行節約貯蓄，別再讓人說：『女人會浪費，沒出息。』」《婦女界》選擇這個方式討論婦女問題，主要與近代中國婦女文化發展有關。在知識份子倡議下，女權成爲晚清及民國以來社會輿論的焦點之一，天足、新式教育、婚姻自主等成爲所謂「新女性」的標誌。同時期社會上也出現「摩登女子」的形象，著重新的（現代的）物質生活及社會關係，由於「摩登女子」的形象大膽前衛，顛覆傳統的性別階序，類似於女權運動所要求的目標，因此某些衛道人士逕將女權運動與「摩登女子」劃上等號，而對於「摩登女子」的「浪漫」行爲的撻伐，也就自然地轉嫁至女權運動者身上。爲了維持女權運動的正當性，倡議者開始把論述焦點轉到婦女自身，不但與「摩登女子」劃清界線，也糾正婦女的行爲。[23] 顯然這是《婦女界》所採取的論述策略，以正視聽。

儘管所有的婦女刊物都希望廣泛地吸引「婦女讀者」，內容仍舊限定了讀者群。《戰時婦女》、《上海婦女》、《孤島婦女》等刊主要目的在鼓勵婦女積極加入抗戰，不分職業或階級，只要是女性，就是它們動員的對象 —— 爲了吸引家庭婦女，《上海婦女》還特地開闢家事專欄。

22 魯依，〈發刊詞〉，《婦女界》，卷 1 期 1（1940 年 3 月 15 日），頁 2。
23 連玲玲，〈「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4（2006 年 12 月），頁 26-42。

不過根據《上海婦女》所做的調查，該刊讀者大、中學生佔十分之七，銀行或機關團體的女職員佔十分之二，家庭婦女只有十分之一；[24] 而現存 2 期的《孤島婦女》中，只特別針對女學生提出建言，其它均爲對婦女的一般性勸誡。[25] 顯然，女學生是這類刊物的主要讀者群。家庭類刊物提供許多治家育兒的祕訣，除了吸引家庭婦女，也希望對不懂治家的女學生及摩登小姐產生「啓蒙」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家庭婦女」並非指所有專職料理家務的婦女，而是近代隨著工業革命及「家政學」概念興起的「家庭主婦」；她們來自富裕家庭、受過新式教育，並以科學、經濟的方式照料家人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26] 至於《婦女界》則以職業婦女爲主要的目標讀者，不但介紹各行各業中婦女工作生活樣態，開闢「技術講座」以增進婦女的工作技能，還刊登「人求事」及「事求人」的免費廣告，協助婦女媒合工作。

售價是另一個讀者定位的決定因素。從滬戰爆發到 1938 年底，上海物價尚稱平穩，每期 8 頁的《戰時婦女》零售價 2 分，20 頁的《孤島婦女》則售 5 分；《上海婦女》每期 32 頁，售價 1 角，而長達 80 頁的《家庭》亦售 1 角。自 1939 年下半起，百物騰貴，對出版業尤爲重要的紙張更因進口管道阻絕而供應不足，不得不使用成本較高的國產紙，導致各報紙雜誌響聲喊漲，[27] 尤其是用紙量高的《家庭》，從 1938 年的 1 角，到 1941 年的 1 元，3 年內漲幅高達 10 倍。《婦女界》發刊期間，正遇到上海物價節節上升，從創刊時的 1 角到終刊時的 5 角，也有 5 倍的漲幅。[28] 物價高

---

24 逸霄，〈本刊出版一週年〉，《上海婦女》，卷 2 期 12（1939 年 4 月 25 日），頁 4。

25 《孤島婦女》1 卷 3 期刊登〈孤島女同學應有的認識〉及〈孤島女學生與節約運動〉，是該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所發的議論。

26 Constance Orliski, "Reimagining the Domestic Sphere: Bourgeois Nationalism and Gender in Shanghai, 1904-1918,"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8)；連玲玲，〈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以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為中心〉，收入巫仁恕、康豹、林美莉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 56-57。

27 高郁雅，〈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申報》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期 24（2009 年 12 月），頁 144-145。

28 不過該刊於調價同時，也增加篇幅，由最早的 30 頁增為 45 頁。

漲促使消費者優先把所得分配於基本維生，有餘裕才能負擔得起書報費用，這使得讀者的階級界線更爲明顯。根據岩間一弘的研究，1941 年 10-12 月份上海工人與職員階層的每月必需收入分別爲 113-147 元及 402-498 元，其中飲食費分別占 66%及 49%，再扣除居住及衣料費用，其它項目的可支配餘額分別占 11.5%及 23.8%。[29] 換言之，職員比工人階級更有餘裕投入非基本維生的項目（如休閒、閱讀等），1 元的書報對職員而言可能只是日常開銷，對工人來說就是奢侈品了。

從內容及售價的分析都可發現，婦女刊物屬於「小眾市場」。根據時人的印象，《上海婦女》發行一年後，每月銷數不過兩千；[30] 該刊被認爲是戰時上海婦女刊物的翹楚，尚且只有這樣的成績，其它婦女刊物更不待言。換言之，婦女刊物無法單靠讀者來維持 ── 事實上這也是其它報刊的共同命運。這是爲什麼刊物主編的首要任務是籌措經費。《上海婦女》主編蔣逸霄更認爲，「要希望讀者購買的代價來維持刊物的生命，在這時期簡直是一個縹緲的夢想。」[31] 堅持必須先籌得一筆至少能支撐半年的出版費用，才著手開辦雜誌；不過經濟問題始終是主編的心頭重擔：

> 最大的困難還是經濟這一點。一年來紙張油墨的價錢，幾乎漲高了一倍。而刊物銷售的區域在日漸的縮小。剛出版的時候，本來福州、廈門、廣州、南昌、漢口等許多大城市，都可以按期寄得去，雖則遞寄很麻煩，而且郵費也比平常為昂貴，但是銷售的數目是很令人樂觀興奮的。出到第三期，福州廈門失陷了，每期少銷四五百。之後廣州不斷被轟炸，郵遞就停止，每期又少銷好幾百。最近，從南昌陷落，浙東封鎖以後，本刊的外埠銷路，只剩了一小部分。若干未曾失陷

29 岩間一弘，〈1940 年前後上海職員階層的生活情況〉，《史林》，期 4(2003)，頁 53。

30 紀華，〈沒有批評祇有希望〉，《上海婦女》，卷 2 期 12（1939 年 4 月 25 日），頁 6。

31 逸霄，〈本刊出版一週年〉，《上海婦女》，卷 2 期 12，頁 2。

> 的城市，雖則還按期寄去，但因郵費昂貴，寄數就不能很多。本埠的讀者，雖則在逐漸增加，然而抵不過外埠減少的數目。因此，本社的經濟遂成了收入逐漸減少，虧累按月增多的狀態。[32]

大體上來說，抗日宣傳性質的刊物都靠發起人支持，因此常有斷炊之虞。其中，《上海婦女》較為幸運，有一位認同其理念的實業家董竹君(1900-1997)為後盾。出身貧寒的董竹君，幼時被賣入青樓，在革命黨人夏之時的幫助下脫離火坑，並隨之赴日本求學，回國後在四川創辦織襪廠、黃包車公司等事業；後來又獨力在上海開設群益紗管工廠及錦江川菜館。受到學運份子文興哲及中共華僑代表團團長盧玉質（也是群益紗管廠股東）的影響，董竹君開始接觸左翼人士及中共黨員並予以接濟，《上海婦女》即是她獨資贊助的刊物。[33]

至於《家庭》、《現代家庭》之類的刊物，從大量的廣告篇幅可以推測，這類刊物主要依賴廣告收入。以《家庭》為例，第 3 卷(1938)的廣告有 18 至 20 頁，約占雜誌總頁數的四分之一；第 5 卷(1939)增加至 48-50 頁左右，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34] 由於資料缺乏，無從考察該刊的廣告收入，不過我們可以當時同類型刊物的《永安月刊》作為估計依據：根據永安公司廣告部人員的預估，每期登載的廠商廣告可得 350 元，加上零售收入 20 元，共可得 370 元，出版成本為 190 元，收支相抵後尚可獲利 180 元。[35] 顯然雜誌的利潤來源並非訂戶，而是廣告廠商。無怪乎黃碧遙把《家庭》之類的期刊稱為「廣告庫」。[36]

《婦女界》的經濟來源不甚清楚，不過從極少的廣告量來看，該刊可能像許多同人刊物一樣，仰賴發起人自掏腰包或少數捐款人勉力維持。該刊到第 3 期才出現第一則廣告，且形制極為簡單，僅有平舖直敘

---

32 逸霄，〈本刊出版一週年〉，《上海婦女》，卷 2 期 12，頁 3。

33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 304-305。

34 此處的廣告頁數是以廣告面積所計算的總數。

35 〈發行「永安」半月刊計劃〉，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Q225-2-47。

36 碧遙，〈一年來上海婦女讀物總檢討〉，《上海婦女》，卷 2 期 6（1939 年 1 月 5 日），頁 4。

的幾行文字，沒有圖案或字體的變化。[37] 而且第一卷有廣告的 8 期中，每期只刊出 1 至 2 則；第二卷起雖廣告量增加，但也只有 3 至 4 則，顯然該刊的廣告收入有限。不過《婦女界》出版不久後，開始運用行銷策略打開市場，如開闢讀者信箱，吸引讀者持續購買閱讀，邀請讀者廣泛介紹募捐，推出「介紹 10 戶送 1 份」的擴大訂戶活動，[38] 並發起「讀者自由捐」。兩個月之內有 30 人響應這項活動，共募集 417.7 元。[39]

戰爭中的「女英雄」

從某個角度來說，所有的婦女刊物都嘗試建構理想的女性形象，孤島時期的婦女刊物也不例外。受到戰爭的影響，此時期最受人景仰的女性是能上戰場殺敵的「女戰士」。而她之所以受到尊敬，不但因爲她參與一場保衛民族的「聖戰」，也因爲她能克服社會建構下的性別差異。筆名「景宋」的許廣平曾針對戰爭中的婦女角色有如下的評論：

> 戰爭，在我們是可歌頌的。這裡沒有誰來操縱，敵人的肆行屠戮，使我們意志堅強起來，一致覺醒。愛好和平的工農民眾，通通在最高當局領導之下，為了自己的利益，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自動參加到抗戰隊伍中，陣容一天天地強大，整齊了，為著光榮，為著未來的自由，不問成人，婦孺，都有這樣的分子在作戰。英勇的戰士，真是筆不勝書，英雄的行為，也是說不勝說。在這裡面，婦女也多少盡了一點天職了。[40]

根據上述說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國家民族的利益、光榮與自由有最高的優先權，不論性別、年齡，都必須善盡自己的職責 ── 因此，女戰

37 〈《藥與化學》廣告〉，《婦女界》，卷 1 期 3（1940 年 4 月 15 日），頁 18。

38 《婦女界》，卷 1 期 2（1940 年 4 月 1 日），頁 26。

39 〈自由捐公佈‧第 1 號〉，《婦女界》，卷 1 期 7（1940 年 7 月 15 日），頁 10。

40 景宋，〈女戰士與女英雄〉，《上海婦女》，卷 2 期 12（1939 年 4 月 25 日），頁 23。

士作為婦女的集體標籤，似乎是一種「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的典型。

不過如果針對個別女戰士的事蹟進行分析，則會發現性別仍是理解「戰士」內涵的重要線索。抗戰期間，趙老太太的英勇故事不斷流傳，正可作為「女戰士」形象塑造的例證。趙老太太原名洪文國(1881-1950)，滿洲鑲黃旗人，生於遼寧省岫巖縣的貧農之家。九一八事變後，其子趙侗加入抗日游擊隊，趙洪文國亦投入支援工作，接待或掩護游擊隊員。盧溝橋事變之前，趙家游擊隊伍主要活動區域是東北及北平；事變之後，日軍清查北平戶口，趙洪文國攜子南遷，輾轉到達漢口。她透過媒體及學校演講為游擊隊募款，就連蔣宋美齡都捐了一千元，至此「趙老太太」才獲得全國性的知名度，於是她的任務從槍林彈雨中的出生入死，轉變為到國內地各地演講勸募。

在諸多關於趙洪文國的報導中，「支持兒子上戰場的母親」是十分鮮明的形象，以下這段敘述相當能表現這種「大義」：

> 有一次年關的時候，趙侗利用休息的時間，想回家來看看一年餘沒有見面的母親，同時，企圖養一養〔作〕戰經年的疲勞。「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果是普通的母親，一定是很喜歡她的兒子回來的，而且一定要做些美味來讓他享受的，但是趙太太卻不然，她知道敵人正在加緊搜索，如果萬一發生意外，那就不幸「死在床上」了。所以，老太太讓她的兒子報告了些戰地上的消息，和完成了些聯絡工作之後，便堅決地要他立即回到隊裡去，不許他在家有片刻的逗留，於是趙侗也就不得不忍著饑餓，帶著疲倦的身體，回到隊伍去。恰巧，沒有過五分鐘，敵人的搜索部隊就到來了，老太太居然能以從容的態度和敵人周旋。[41]

傳記作者特別強調趙洪文國為了國家，慨然犧牲與兒子團聚的機會；而她「成全大我」的先見之明，竟然幫助她的兒子成功地躲避敵人的追捕。這段敘述一方面鼓勵所有母親以國家大局為優先考量，支持兒子從軍報

41 鄭彰群，〈學習趙老太太〉，《戰時知識》，卷2期3（1939年2月），頁13。

國；另一方面也以巧合情節加強大我、小我之間的「果報」關聯：正因爲趙洪文國以國家爲重，才讓趙侗「奇蹟」式地逃脫。

有趣的是，在許多傳記及報導中，趙洪文國的角色定位不只是趙侗的母親，也是所有戰士的母親。尤其是她入川宣傳抗戰時，受到蔣委員長的接見，並稱之爲「游擊隊之母」，從此這成爲趙洪文國的稱號，甚至有作者將這個寓意性的稱呼視爲母子之愛的延伸：

> 她愛她的游擊隊中的任何戰士，也是和愛她的子孫一樣，因此，游擊的士兵，都叫她做「媽媽」。我們現在稱她老人家做「游擊隊之母」，和這是有很大關係的，趙老太太是東北義勇軍〔名符其實〕的母親。當然也是全國的母親，是一切母親的模範。[42]

爲了宣揚趙洪文國的抗日精神，國民政府一方面把她在四川記者會上的演說辭編入小學的戰時國語教材；[43] 另一方面蔣宋美齡責成中央電影攝影場將趙氏母子在北平近郊游擊的經過，拍攝成影片，由潘孑農撰寫劇本、名攝影師周克執導，預定主要演員爲趙丹、王蘋、英茵、顧而已、施超、魏鶴齡等人。片名定爲「民族的母親」，顯然將趙洪文國的母職意義，從「游擊隊的建立者」進一步擴大爲「民族生命的守護者」。[44]

不過，不論是「游擊隊之母」或是「民族的母親」，趙洪文國的工作一直被描述成支援性質的任務，如籌款購買運送槍枝、宣傳組織民眾等；這一點在馮玉祥的〈趙老太太〉的詩作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 老太太，女英雄，她兒子，名趙侗，日本鬼，陷北平，組游擊，大進行！需槍彈，作軍用，老太太，極高興，在平郊，找散兵，收槍彈，自運送：數十里，爬山峰，不顧累，不怕病。三村嫗，甚感動，幫著搬，不稍停。義軍起，屢得勝，

42 鄭彰群，〈學習趙老太太〉，《戰時知識》，卷 2 期 3，頁 13。

43 張若英，〈「趙老太太對記者演說詞」教學實例 —— 小學高級戰時國語教材及教法範例之一〉，《進修》，卷 2 期 6（1940 年 3 月 20 日），頁 21-23。

44 潘孑農，〈民族的母親（電影故事）〉，《時事類編特刊》，期 27（1938 年 12 月 1 日），頁 57。

寇軍急，擬圍攻。美友某，先知情，找太太，去報信。爬重山，越峻嶺，一晝夜，完使命。望兒山，敵進兵，遇抵抗，大犧牲。敵羞怒，下命令，在故都，搜反動。老太太，真機警，偕丈夫，攜兒童，離虎口，奔前程。又遇著，汪時生，太行山，組義勇。感動了，老百姓，皆加入，數極眾。土匪們，亦欽敬，不搶劫，來投誠。汪時生，善運用；老太太，辦的精：將部隊，報官廳，由某署，須命令，與趙侗，兩歸併，請得了，指揮名。老太太，細權衡，要如何，拚命衝，和兒子，去打通。這計劃，正實行，十有九，可成功。某記者，聞其名，在某地，見英雄。袍藍布，帽呢絨，滿臉上，皆霜風，精神好，身體成，極坦白，極真誠。她說話，亦中肯：知識界，責任重，應下鄉，導民眾。鄉下人，有大能，發動後，力量增。普遍的，老百姓，要趕快，去喚醒，全民族，死鬥爭，要團結，要互信，到最後，必獲勝。老太太，太可敬，我同胞，應感動。學與商，工和農，無性別，無年齡，齊奮起，拚性命。時已急，莫再等！[45]

馮玉祥十分生動而細緻地描述趙洪文國的任務，然而這些工作內容大致可以用「民族的母親」影片中「游擊隊之歌」的兩句歌詞加以總結：「兒子打頭陣，母親做後盾」，這也體現了作者對於戰時性別角色分工的期望。

相較之下，《上海婦女》對於趙洪文國的形象塑造有著相當不同的論述。在〈女戰士與女英雄〉一文中，作者對趙老太太的描述是「雙手拿鎗，出入敵人勢力範圍之內，接濟糧食，偷運軍器，指揮作戰，不愧爲北方之強。」由於趙老太太不是本文的主題，只是事例之一，因此作者並未詳細描述她的生平事蹟；但從這段簡短的評價可以看出，作者刻意避免用「支援性」的字眼來形容趙老太太的工作，甚至完全不提一般所熟知的「游擊隊之母」的稱號，而將她定位爲「眞的女戰士」。[46] 另

45 馮玉祥，〈趙老太太〉，《抗戰畫刊》，期 14（1938 年 6 月 10 日），頁 18-19。
46 景宋，〈女戰士與女英雄〉，《上海婦女》，卷 2 期 12，頁 23。

一篇〈趙老太太在昆明與重慶〉，主要介紹她在後方的演講及募款工作，和一般報導不同的是，作者則以訪談的方式，讓趙洪文國以第一人稱爲自己發聲。此外，作者似乎也有意將趙洪文國塑造成「婦女工作者」：作者在訪談時提出「老太太到昆明以後，對於昆明的婦女工作，作何種觀感？」，同時也向她報告上海一年來婦女工作的梗概。又藉著趙洪文國的口，說明華僑婦女如何回應抗戰救國的聖召：「他們聽了我的演講，不斷地給婦女慰勞總會匯錢。許多青年婦女當眾要求跟我回國打游擊，只因爲我今後的工作沒有一定，只好使她們失望得哭泣起來。」[47] 在《上海婦女》的建構下，「趙老太太」的形象已超越保衛鄉里的「游擊隊之母」，而成爲名揚海內外的婦女領袖。

當然，「女戰士」只是「女英雄」的一種類型，《上海婦女》所形塑的「女英雄」角色亦極爲多元，有刺殺漢奸的女學生，[48] 也有以戲劇宣傳抗戰的女藝人，[49] 還有熱心獻金的妓女。[50] 不過，像《戰時婦女》、《上海婦女》等抗日期刊，「愛國」、「戰鬥」的意象較爲鮮明，其它刊物隨其不同宗旨提倡不同類型的婦女楷模。例如，《家庭》、《理想家庭》所描繪的女性形象以善於持家育兒的「賢妻良母」爲典型，特別注重家庭關係的維持，主題包括「結婚成功的先決條件」、「怎樣使孩子們愛你？」、「怎樣對付你的男朋友？」、「你是一個好妻子嗎？」等。換言之，《家庭》對婦女的期待是照料家庭、使之成爲家人精神安慰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刊物並不使用「女英雄」一詞來描述女性典範，可能因爲「英雄」過度「陽剛」，與其建構的理想女性特質不甚相合。

以婦女職業爲號召的《婦女界》，則塑造「另類女英雄」。在一年多的發行期間，《婦女界》並未鼓吹婦女加入戰鬥行列，甚至很少談論

---

47 白熊、味辛，〈趙老太太在昆明與重慶〉，《上海婦女》，卷 3 期 1（1939 年 5 月 10 日），頁 22-23。

48 明日，〈女學生花玉潔〉，《上海婦女》，卷 1 期 4（1938 年 6 月 5 日），頁 15。

49 幽錦，〈介紹兩位女藝人〉，《上海婦女》，卷 1 期 6（1938 年 7 月 5 日），頁 26-27。

50 麗珠，〈南國女兒的獻金熱：一位可敬的神女〉，《上海婦女》，卷 1 期 10（1938 年 9 月 5 日），頁 8-9。

婦女應如何響應抗戰行動。有趣的是，即便介紹該刊所關注的職業婦女，也很少用「楷模」的論述形式，而多半以第一人稱的語氣，披露「平凡」職業婦女的生活甘苦；因此《婦女界》和《家庭》一樣，很少用「女英雄」來描述婦女角色。唯一一篇以「女英雄」爲題的文章〈我們要做新中國的女英雄〉中，作者提醒職業婦女不要僅以技術操作（如打字員、接線生）爲滿足，應當要進一步研究其中的原理與構造，並明白如何管理建造 ── 這都算是參與抗戰的表現：

> 我們多學一種技術，就是多加抗戰建國的一種武器；多培養一分才能，就是多增加國家社會的一分力量，幸福的生活，也就早一天實現。我們不單要學習勞動的技術，生產的知識，還要學習計劃，經營管理生產事業，一直到管理國家的政治！我們要做女文豪，女科學家，女工程師，女政治家……我們要做新中國的女英雄！[51]

在這張「女英雄」清單裡，作者特別突顯男性主宰的職業場域，意在打破性別化的職業階層結構；有趣的是，作者並未將「戰士」納入，可能因爲這只是列舉項目，無法涵蓋所有的職業種類。不過，儘管《婦女界》和《上海婦女》一樣，都強調「女英雄」跨越家庭的界線，承擔公共領域的新責任，兩者對於「女英雄」的意義有不同的詮釋：《上海婦女》乃從「愛國」的角度建構「女英雄」，不論是職業婦女、家庭婦女、女戰士、甚或是道德有瑕疵的女盜匪及妓女，只要認同抗戰目標並參與救國行動，都算得上是「女英雄」；換言之，「女英雄」必須在抗戰的框架下才能顯示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婦女界》則從職業的自主性及專業性來形塑「女英雄」，也就是透過具有完備知識與技術的「女英雄」，新中國才得以建立。

---

51 遼音，〈我們要做新中國的女英雄〉，《婦女界》，卷1期5（1940年6月5日），頁5。

戰爭下的「受害者」

戰爭的本質是暴力，無可避免地製造死亡與傷害。爲了合理化參戰行動，或激發讀者的抗戰情緒，戰時刊物經常報導前線或後方的死傷情況；而戰爭下的受害者也成爲《上海婦女》、《孤島婦女》等刊物關注的焦點，「難民」便是其中之一。在炮火的威脅下，特別當日軍逐步占領江南後，許多人從上海華界及其它鄉鎮逃至相對安全的租界。根據統計，戰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總人口不足 170 萬，到了 1942 年激增爲 244 萬人，其中法租界人口幾乎增加八成。[52] 爲了安置大量湧入的難民，上海各界紛紛組織難民收容所，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一點上，《上海婦女》竭盡所能地發揮媒體作用，從發刊之初，便經常報導相關消息，或介紹難民收容所的工作內容，或刊登名人在救難遊藝會上的致辭，或披露難民生活的艱辛，目的在引起讀者對於難民問題的注意，並呼籲對難胞伸出援手。

在難民相關的報導中，「難童」是相當突出的主題，《上海婦女》曾使用 6 幀難民照（圖）片爲封面，其中 4 幀是難童。近代以來，「兒童」一直和強國強種的國族論述聯繫在一起。基於「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信念，啓蒙知識份子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兒童教育理論與方法，甚至主張將兒童從家庭及宗法制度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爲「社會的人」及「國家的人」，進而提出「幼者本位」的新社會階序。[53] 不過在抗戰爆發之前，這多半還只停留在概念層次；當隆隆炮火摧毀許多家庭，國家及社會團體開始有計劃地收容這些流離失所的兒童，直接承擔養育及教育工作。戰時兒童保育工作，除了是一種社會救濟，也是戰線的延長：

52　公共租界人口從 1937 年的 1,218,630 增為 1942 年的 1,585,673，法租界則從 1936 年的 477,629 增為 1942 年的 854,380。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90-91。

53　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與實踐(1900-1937)》（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頁 137-141。

戰場上每天損兵折將，兒童正是未來戰力的儲備；天眞無邪的兒童也是敵人掠誘的對象，以提供地方情資。[54] 換言之，兒童是交戰雙方亟欲爭取的「資源」，故此，收容所對難童的管理方式，往往有別於其它成人難民。例如，婦孺兼收的上海梅園收容所依年齡將難民分爲老婦、少婦、少女、兒童四組，兒童需受全日的知識教育；少女上午受知識教育，下午參加生產工作；少婦及老婦除一至二小時的精神訓練外，其餘時間則照護孩子及參加生產。[55]

儘管這些兒童因飽經戰火而無家可歸，但《上海婦女》的作者並不刻意突顯他們的悲慘故事，而把敘述重點放在孩子們的天眞可愛。一位在收容所擔任志工對難童的印象是「這些孩子委實是太有趣了，他們時時能給你莫大的慰藉，減輕你內心的苦悶，這種情形，你那能別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已是喪失了雙親的孤兒呢？」[56] 也有作者描述難童在收容所的生活情形，特別強調知識學習、身體鍛鍊及養成紀律，例如中華慈幼協會辦的兒童收容所，擬定明確的課程表，要求兒童每天按表操課，並實施疾病檢查，同時要求每天洗澡及上體育課，進食時分菜分湯以符合衛生習慣。[57] 在平時，窮苦之家的兒童並不容易享有這樣的教育資源，卻在戰時藉著「難童」的身分得以分潤。此外，作者還將難童塑造成愛國的「抗日宣傳員」：這些兒童乃因戰爭才導致家破人亡而必須住進收容所，因此日本成爲其理所當然的敵人。在收容所的愛國教育下，國仇與家恨聯繫在一起，把「爲親人報仇」轉化爲「爲國家復仇雪恥」，難童的創傷也就成爲最激動人心的精神動員教材。

相比之下，難婦的「受害者」形象較爲明顯，多半描述其家鄉遭轟炸、生活無依的情況。爲了突顯戰爭影響的全面性，《上海婦女》刻意披露不同背景婦女的遭遇，顯示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鄉村城市，

54 丹侖，〈戰時兒童保育工作〉，《上海婦女》，卷 3 期 9（1939 年 10 月 25 日），頁 5。

55 魯弟，〈梅園收容所參觀記〉，《上海婦女》，卷 1 期 3（1938 年 5 月 20 日），頁 9-10。

56 非文，〈教育難童瑣記〉，《上海婦女》，卷 3 期 12（1939 年 12 月 10 日），頁 23。

57 宛青，〈兒童收容所概況〉，《上海婦女》，卷 1 期 1（1938 年 4 月 20 日），頁 15。

都同樣面臨戰爭的威脅及逃難的命運。可能受到作者本身的左傾思想，關於中上階層婦女的故事，往往強調其遭逢變故的無能為力。在〈兩個難婦訪問記〉中，作者採訪投依在梅園收容所的兩名婦女，一是上海華光小學校長的妻子章杏珍，一是上海近郊大場地主家庭的女兒楊杏大，原本都過著不愁吃穿的安逸日子。滬戰爆發後，華光小學被燒得精光，章杏珍一家人四散避難，她只能帶著兩個女兒暫宿於收容所。楊杏大也因為家中房屋被炸毀，帶著兩個妹妹逃往上海，她們卻相繼病死途中，只能草草收殮。[58] 另外，在〈街頭一少女〉的短篇小說裡，作者描述一位富家千金，父母死於戰亂，自己則跟著一群陌生人沿路乞食到上海，險些喪命。在這三個故事裡，作者強調她們對於未來的無知與恐慌，唯一的希望是早點與家人團聚 ── 儘管難民已疲於應付眼前的基本生存，遑論對未來有任何的打算；但這樣的情節安排仍蘊含警示作用：正如流落上海街頭的那位小姐所懺悔的：「當初享樂太甚，沒有一些技能、學問，不然也可以去當看護，或者尋點別的小職業，也不致受凍、挨餓。」[59]

儘管下階層婦女教育程度不高，但她們有較強的生活適應力，成為戰亂時的一項生存優勢 ── 在〈街頭婦女談瑣〉一文中，作者藉著兩名流落上海的婦女突顯這個現象：一位從北平來的小學教員，在人浮於事的孤島上難以謀事，一面感嘆自己衣著破舊，像工人一樣，一面懊悔未曾練習做工，以致戰亂當頭，「如一個廢人，不能拿勞力來養活自己。」另一位則是天津人，丈夫在戰亂中失業後，她只好靠烘山芋維生。有趣的是，在作者安排下，這位婦人不但較能認清現實，放下身段地工作，也具有正確的政治意識，不斷地鼓勵小學教員：「我們現在過的日子，真難說，是不是？誰知道此刻以後的事呢？說不定後一刻我們就會死，吃不到飯……但和日本打仗，中國是必定要勝的，只要我們能等到那時候，我們真是福氣了。」這位平凡婦人的信心，竟使小學教員感動得「覺到新中國已在每一個有『血情』的中國人中站立起來！」[60]

58 青竹，〈兩個難婦訪問記〉，《上海婦女》，卷 1 期 3（1938 年 5 月 20 日），頁 22-23。
59 李士燦，〈街頭一少女〉，《上海婦女》，卷 1 期 7（1938 年 7 月 20 日），頁 26。
60 璐，〈街頭婦女談瑣 ── 她們對於抗戰的觀感〉，《上海婦女》，卷 2 期 7（1939

在所有「受害者」故事中，最悲慘的要算是性暴力的片段。從古至今，不論中西，戰爭幾乎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性暴力，這不僅是一大群男人在預期死亡的高度壓力下尋求發洩的途徑，也是羞辱屈服敵方、向敵方施展權力的姿態。女性主義心理學家Eileen Zurbriggen指出，戰爭與性暴力高度相關，主要歸因於兩者背後所潛藏的男性霸權。傳統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y)包括進取、富侵略性、控制等特質，競賽及軍事行動是最容易養成並展現這些特質的場域；同時「男性氣概」也體現在對女性的征服 ── 性暴力便是男性對女性支配權力的極致表現。[61] 最近女性主義學者更從 1994 年的盧灣達(Rwanda)戰爭中發現，性暴力並非戰爭的副產品，也不是軍事衝突的意外事件，而是有計劃、有目標的策略，因此提出「性暴力是戰爭武器」的概念，闡釋戰時性暴力的特徵 ── 系統性、全面性、整體性。[62] 抗戰期間，日軍也同樣進行慘無人道的大規模強姦與屠殺，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軍攻下南京的第一個月，就有超過 2 萬名婦女被強姦；到 1938 年 2 月共有 8 萬人遭到性侵害。[63] 不過一直到同年 9 月《上海婦女》才開始披露這些故事，且集中於 9 至 12 月各期，到了 1939 年 6 月之後，該刊不再有這類的報導或小說情節。根據筆者統計，《上海婦女》發行期間共登載 10 則性暴力的相關消息，不到該刊總文章數（1,089 篇）的 1%，比例並不高。

對受害者或聽眾而言，性暴力都是極爲恐怖的經歷，不過作者披露這些故事並不完全爲了博取讀者的同情，而是藉由駭人聽聞的情節來激發讀者的抗日情緒。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報導淪陷區婦女生活的目的，

年 1 月 20 日），頁 22。

61 Eileen Zurbriggen, "Rape, War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Masculinity: Why Our Refusal to Give Up War Ensures that Rape Cannot Be Eradicated,"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4 (2010), pp. 538-549.

62 Doris E. Buss, "Rethinking 'Rape as a Weapon of War,'"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7 (2009), pp. 145-163.

63 Lee En-han, "The Nanking Massacre Reassessed: A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the Factual Number of Massacred Victims," in Fei 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s.,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p. 50.

「不希望讀者爲之同聲一哭，惟願都能舉起鋼鐵一般堅實的拳頭，爲整個民族奪取生存權利；掙脫桎梏的鎖鍊！」[64] 正因如此，這類故事的結尾多半停在「婦女受辱」一節，甚少關注婦女自身的結局 ── 除了被殺或自殺之外。換言之，在這些受害者故事中，個人的創傷被等同、甚至被置換爲國家的恥辱，作者所提的因應之道往往也都從「保存國家民族」這種宏大卻又模糊的意識形態著手，完全忽略個人基本生存權利的討論。

尤有甚者，許多受辱婦女往往遭遇「二度受害」。日本學者江上幸子曾針對丁玲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及婦女刊物的言論，討論日軍暴行下中國婦女的「多層次傷害」：婦女被日軍強暴或被迫做慰安婦後，往往無法見容於家庭或社會，甚至發生被強暴的中國婦女生下「敵人之子」慘遭活埋的悲劇。[65]「多層次傷害」主要來自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貞操觀念，正如《上海婦女》的作者所評論的，男人不願迎娶被日軍強暴過的未婚妻，「不是因迷信而懼怕『事業不會成功』，而還是因她不是『處女』而不願與她結婚的藉口而已。」[66] 這種「封建傳統」不僅存在於許多人的腦袋裡，也出現在「受害者論述」的字裡行間。在〈一對流浪在街頭的夫婦〉的報導中，主角夫婦原是薄有資產的裁縫店主，在戰亂中店鋪被燒個精光，只好把太太送回無錫娘家，路上遇到日軍，男人被倒吊在電線桿上打得皮開肉綻，女人則被一群日本兵輪姦。在這段受害者的描述中，性別與性成爲建構創傷的基本元素：同樣遭到日軍凌虐，男主角所受的身體傷害，使他無法繼續拉黃包車而成爲露宿暗巷的乞丐；女主角則被形容爲「一團黑的東西，那是一個失去了人樣的『人』」 ── 而結合國家、家庭與個人恥辱的性，正是使她被貶抑爲非人存在的主因。不僅如此，爲了進一步強化恥辱感，作者還賦予日軍的性暴力「疾病、污穢、不道德」等意涵，這特別反映在男主角對這個故事的總結：

64 茅塞，〈內地婦女生活 ── 失陷後的通州婦女〉，《上海婦女》，卷 1 期 11（1938 年 9 月 20 日），頁 16。

65 江上幸子，〈日軍婦女暴行和戰時中國婦女雜誌〉，《社會科學論壇》，期 7-8(1999)，頁 25。

66 螢，〈所謂「貞操」問題〉，《上海婦女》，卷 2 期 1（1938 年 10 月 20 日），頁 22-23。

> 你們沒曉得她這個人就比陰溝還臭，要是跟從前比一比，連我都會不認識她，真罪過，活活的給折磨到這樣。一個女兒是去年養的，因為娘生了這樣病，每日哭哭啼啼，沒有了奶，冤枉了她這條小生命，死了！我自己呢，我的身體不讓我再去拉車，你們看，這還像我嗎？……我輕了十多磅呢！[67]

就連女主角也把被強暴一事喻爲「自己作孽」，顯然作者對於受暴婦女有著極爲複雜的感受，她們是日軍性暴力的直接受害者，是國家遭受日軍欺凌的象徵與傷痕；在傳統的貞操觀念下，又被定爲禮教的違背者，遭到社會的排擠，可說是戰爭下婦女多重受害的典型。

因此，這也就不難想像「節烈婦女」仍是最受推崇的受害女性形象，尤其是爲保護貞操而犧牲的婦女，比起奮力抵抗卻因不敵而被強暴的姐妹們獲得更多的喝采。我們可以比對以下兩段描述看出其間的差異：

> 一個新娘，第二天就要結婚了，什麼嫁奩啦，禮服啦，都預備好了，正和客人鬧著玩時，忽然鬼〔筆者註：日軍〕來了，於是和三個女伴同道的逃逃逃，逃到池塘邊，再也沒有路了，而鬼卻越追越近，她不願把清白的身體交給鬼，心裡一急，就什麼也顧不得的往水裡一跳：撲通，接著那三個女伴也跳下了。鬼看著她們困難地掙扎著，水從她們的嘴吧裡嗾下去，看得有趣了，哈哈地笑著拍著手，照呼別的朋友也來看，等到她們奄奄一息，快將死去時，再去打撈起來，還是免不了被糟蹋，結果，那新娘躺在血泊裡死了。[68]
>
> *** ***
>
> 有一某姓家的寡婦，為反抗被人污辱，以剪刀作武器戳傷X軍三人，結果作了節烈的犧牲。這種使人敬佩的行動，實在是

67 桂芳，〈一對流浪在街頭的夫婦〉，《上海婦女》，卷 2 期 1（1938 年 10 月 20 日），頁 13-14。

68 珪方，〈金陵來客一席談〉，《上海婦女》，卷 1 期 11（1938 年 9 月 20 日），頁 12。

值得我們在這裡一提的。[69]

這兩段故事的女主角都爲了保全貞操被逼上絕路，不過作者卻對她們有不同的評價，其間差別在於前者「被糟蹋而死」，而後者「作了節烈的犧牲」── 女性身體的「清白」成爲最重要的評判標準。這種敘事方式與明清以來世所傳誦的貞節烈女故事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加害者不是一般男人，而是入侵中國的日本士兵。[70] 換言之，戰時民族主義的高漲並未如某些愛國主義者所言，是婦女解放的基礎，反而進一步強化對性道德的要求；貞操觀念與民族榮辱的結合，結果使婦女必須背負更沈重的十字架。

比起《上海婦女》所披露的難民及受暴婦女，《婦女界》所描述的「受害」情節就輕微得多，泰半是關於物價上漲及求職困難的抱怨 ── 後者只刊登過兩篇與難民相關的報導，對於日軍強暴婦女的消息則付之闕如 ── 這些問題在戰前即已存在，惟戰爭的爆發加劇其嚴重性。正因爲日常生活的斷裂與延續，使兩類「受害者」的戰爭經驗大相逕庭。對於難民及受暴婦女而言，戰爭是侵犯其身體及財產的直接力量，可以說是其生命史的轉折點，同時有十分明確的敵人，因此《上海婦女》的受害故事往往透露著強烈的復仇心態。《婦女界》裡哀嘆「吃飯難」的婦女雖然理解整體經濟的惡化乃由戰爭所引起，但這並非立即的正面威脅；倒是看似無止盡的生活壓力使人產生厭戰心理。正如一位讀者寫信給《婦女界》抱怨「打仗打得她生活苦死了」，她希望和平，只是怕被視爲漢奸。[71] 至於《家庭》則對戰爭下的受害者毫無著墨，不但無視於難民及受暴婦女的存在，對上海市民切身的物價、失業等問題也輕描淡寫，顯然這份刊物並不想用「戰爭」一事來打擾讀者 ── 該刊「家庭信箱」所登載的問題幾乎都圍繞著夫妻子女相處、身體保健等事，嗅不出任何火藥味。

69 丁辛，〈淪陷後的青浦婦女〉，《上海婦女》，卷 2 期 5（1938 年 12 月 20 日），頁 13。

70 明清貞節烈女的研究汗牛充棟，晚近出版者可參考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71 〈中日戰爭〉，《婦女界》，卷 1 期 5（1940 年 6 月 5 日），頁 6。

戰爭中的「他者」

從 19 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上海不但是進口洋貨的集散地，也是外國人及外來知識的轉運站，使刊物也呈現「國際化」的特色；本文所分析的幾份婦女期刊均相當重視國際消息的翻譯與報導，惟各刊乃根據刊物性質選擇新聞內容。例如以建立現代家庭爲宗旨的《家庭》，經常介紹歐美家庭的日用商品、生活習慣及名人的家庭生活；以職業婦女爲目標讀者群的《婦女界》則注意歐美婦女就業的發展趨勢。正如前述，《家庭》與《婦女界》所關注的問題具有時代的連續性，因此許多論述與報導與戰前刊物差別不大。

爲號召抗日而出版的《上海婦女》也十分關切外國婦女的動態，表 2 列出一至四卷對各國婦女的報導文章數，從這項統計可以看出，該刊對於蘇聯婦女的報導最多，符合該刊的左派傾向。關於蘇聯婦女的報導，集中在兩種主題，一是婦女如何參與革命與建國工作，一是革命對解放婦女的絕大貢獻。《上海婦女》所介紹的幾位蘇聯婦女，多半出身貧窮家庭，因著共產革命的成功而得以翻身，像斯密爾諾瓦女士從一名平凡無奇的工廠女工，成爲蘇聯國會女議員；[72] 克留波娃女士原來是一名擦洗婦，集體農場的學習使她成爲精明能幹的管理者，甚至被選爲最高蘇維埃的女代表。[73] 此外，亦有些作者強調共產革命的成功大大地解放蘇聯婦女，不但受教育和從事職業的人數大幅增加，政府設立的公共食堂、托兒所、幼稚園也使婦女擺脫家事的羈絆，能與男子一樣地參加社會工作；同時男女不但同工同酬，法律更給予母性的保護。[74] 換言之，這些作者認爲，中國婦女運動的訴求，均在蘇聯得到實現，難怪《上海婦女》

---

72 蘇聯．倪啟晉作，季子譯，〈斯密爾諾瓦女士印像記〉，《上海婦女》，卷 1 期 6（1938 年 7 月 5 日），頁 9-11。

73 陳騮譯，〈克留波娃〉，《上海婦女》，卷 2 期 2（1938 年 11 月 5 月），頁 14。

74 夏之仁，〈走進社會以後的蘇俄婦女〉，《上海婦女》，卷 3 期 12（1939 年 12 月 10 日），頁 25-28。

表 2 《上海婦女》第一至四卷對各國婦女的報導則數

國　家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合　計
蘇　聯	8	9	7	5	29
日　本	5	9	7	7	28
德　國	3	1	4	-	8
美　國	2	4	2	1	9
法　國	2	-	1	1	4
印　度	2	1	-	-	3
英　國	1	-	1	-	2
西班牙	1	-	-	-	1
朝　鮮	-	-	1	-	1
合　計	24	24	23	14	85

註：若一篇文章分節介紹數個不同國家，則以被介紹的國家數計算。本項統計包括社會報導、訪談、小說、書信等文體，其中包括 4 篇關於兒童的介紹。

對蘇聯經驗大加宣揚。

《上海婦女》所報導次多的外國婦女生活是日本婦女。相對於蘇聯婦女的英雄姿態，日本婦女多半被描繪成中日戰爭的犧牲者，並且加害者不是敵國，正是其本國的軍國主義者。像婦女領袖石本男爵夫人因提倡生育節制而遭逮捕，獲釋後被禁止從事節制生育的演講；岩倉子爵的女兒亦因反戰而被迫自殺。[75] 另有一位作者提到，戰時日本政府不但對夜間燈火加以管制，並實行舞客「署名制度」，凡到舞場的人，必先辦理登記手續，使舞廳生意大受影響，許多靠夜市爲生的婦女受到衝擊，

75　三石，〈彼邦婦女的分野〉，《上海婦女》，卷 1 期 7（1938 年 7 月 20 月），頁 13。

甚至名聞全國的不夜城 ── 銀座街，也成爲垂死的街頭。此外，政府的統制原料及節制物源政策，使不少生產部門被迫停業，大批女工被捲入失業浪潮。[76] 特別透過一名日本女工的聲音，表達戰時丈夫被徵召、隻身在工廠做工的艱困生活，再加上政府的物資統制，工廠面臨關門的窘境，感嘆自己「一個人走到那裡去呢？」[77]《上海婦女》刻意強調日本婦女「犧牲者」的角色，顯然是一種抗戰宣傳的策略。作者「蕾子」便認爲這場戰爭是日本軍閥獨裁的結果，「因爲師出無名，所以國內人民，不但沒有給予同情和擁護，並且是非常的不滿意……中日戰事深入內地，戰區地域擴大、戰線延長之後，便由憎惡之念，逐漸變成厭戰反戰的心理了。」[78] 換言之，強調婦女的「受害者」形象，是爲了強化日本人民厭戰的印象，使讀者了解日本作戰的艱難，進而加強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心。

至於歐美婦女的介紹，則強調其熱中於戰時服務的形象。在一篇報導中，作者稱讚「現今英國的婦女，無老無少，俱願以一身貢獻國家。自倫敦以至其他的都市，已婚未婚的婦女，爭先恐後地擔任汽車夫，看護婦，空襲警報，電話，打字，救火，洗衣等工作……反而因爲她們過於愛護國家，政府至採取勸告態度。大致稱青年婦女，不可因一時的衝動，拋棄原有的工作。」對於法國婦女，這位作者同樣提到「各機關事務所，已由婦女代替了男性。各工廠則由老人與小孩晝夜加工，而由病弱的老人，擔任指導。華貴的婦人，擔任從軍看護或後方保護兒童；中流的主婦，女店員，女學生，則擔任司機，掘壕等較繁重的工作。昔日的華服已束之高樓，新的時裝爲簡單的軍服加上防毒面具。」至於德國婦女，由於納粹政權曾爲了解決失業問題，鼓吹婦女回到廚房，把職位

76 堡村，〈戰時的日本婦女〉，《上海婦女》，卷 1 期 11（1938 年 9 月 20 月），頁 11。

77 寺岡千惠子著，寶琛譯，〈一個日本女工的戰時生活自述〉，《上海婦女》，卷 2 期 4（1938 年 12 月 5 月），頁 13-14。

78 蕾子，〈厲行統制下的日本民眾〉，《上海婦女》，卷 2 期 3（1938 年 11 月 20 日），頁 13。

讓給男子，因此德國常是「女權倒車」的代表，[79] 故戰時的德國婦女也經常被描繪成國家動員下的被動回應者或犧牲者。作者以政府分配食物爲例，說明德國家庭主婦有時必須在食物店外守候數小時之久，才能購得食物。「但此種守候的主婦，有時運道不佳，遇著警車來臨，常被捕去，罰作廚房雜務，如削馬鈴薯，洗衣，燒飯之類。」關於家庭主婦「被捕」的理由，作者並未交代清楚，可能是一種義務勞動服務，不過作者用「捕」、「罰」等字眼，顯然想要突出德國獨裁政權壓榨人民的形象。[80]

除了報導歐美婦女對本國戰爭的參與，《上海婦女》還描述居留或訪問上海的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或協助。例如 1938 年，《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Edgar Snow)及其夫人停留上海，《上海婦女》的編輯透過友人介紹採訪斯諾夫人(Peggy Snow)。《西行漫記》是美國記者斯諾於 1936 年在陝甘寧邊區的見聞錄，先在英美報刊發表，後來編輯成冊，翌年 10 月在倫敦出版，僅一個月便再版五次，1938 年 1 月中譯本問世，在青年學生中相當受歡迎。斯諾夫人也在陝北停留四、五個月，主要工作是採訪當地的女界領袖，並將她們的傳記發表在美國的雜誌上 ── 這樣的背景使她成爲《上海婦女》採訪的對象，不但透過一位「無黨派色彩」的外國記者說明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性，澄清外界對共產黨婦女領袖的誤解，也對中國抗戰的形勢信心喊話。[81] 另一篇蘇唐女士訪問記，也是透過外國人傳達抗戰必勝的信念。這篇訪問記對蘇唐女士的背景介紹很少，只提到她是 1922 年就到上海來的法國人，八一三戰役爆發不久，她就開始進入難民收容所服務，她把救濟工作當作家庭來經營，把難民當作兒女來照顧，被作者形容爲「中國之友」。就像訪問斯諾夫人一樣，

---

79 民國時期曾出現過兩波「婦女回家」辯論，分別在 1930 年代及 1940 年代，德、義等國的「母性復興運動」往往成為論者的理論基礎。關於這兩次辯論，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 287-296；呂芳上，〈抗戰時期的女權論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1994 年 6 月），頁 81-115。

80 碧梧，〈日英德法婦女的現狀〉，《上海婦女》，卷 3 期 8（1939 年 10 月 10 日），頁 8-9。

81 鐵懷，〈史諾夫人韋爾斯女士訪問記〉，《上海婦女》，卷 1 期 5（1938 年 6 月 20 日），頁 8-10。

作者也問蘇唐女士對於中國婦女的看法，以及對中國抗戰前途的評估，蘇唐女士的回答可以說完全符合《上海婦女》對婦女解放及民族解放的宣傳：

> 我覺得中國女人是在長足的進步中，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幾乎要超過男人們……受過新教育的智識婦女，愛國情緒很熱烈，差不多都英勇地參加抗戰，做各種教育，募捐，慰勞，組織……的救亡工作，她們爭取女權，關心國家和社會事業，是跟著新中國一道上進的，像這裡的黃女士就可作為代表，我也看不出她們跟法國女人有什麼分別。
>
> ……
>
> 中國的武器雖不如日本，精神卻是勇往直前的。在從前，中國有一句話叫做「五分鐘熱度」，但這一次卻是越抗戰越堅強。總之，我是中國的友人，我心裡想得到的，只是朋友的勝利。[82]

結　　論

本文透過孤島時期的婦女刊物，探討戰爭時期婦女文化的建構。從以上分析，至少可以歸納出幾個特點。首先，孤島時期婦女期刊的論述重點，大致上延續戰前的論辯，仍圍繞「改良家庭」、「經濟獨立」、「婚姻自主」等核心議題展開討論。根據馬育新的研究，從晚清到抗戰前夕，婦女期刊一直是爲了捍衛女性權益而存在的載體，因此女學、婦女參政、職業權、自由婚戀等問題是這段時期婦女期刊的主軸[83]——這的確也是《上海婦女》、《婦女界》等期刊最常見的話題。不過有兩個新現象值得觀察，一是戰爭成爲討論的重點之一，這當然是因爲抗日戰

82 武桂芳，〈中國之友蘇唐女士訪問記〉，《上海婦女》，卷 1 期 7（1938 年 7 月 20 日），頁 15。

83 Yuxin Ma,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0), pp. 22-24.

爭所引發的效果；本文所分析的「女英雄」、「受害者」、「外國婦女」等形象，即爲抗戰軍興後的產物。二是戰前強調女性時尚與身體美的刊物，不再出現。1930 年代上海掀起「摩登女子」的熱潮，引起人們對她的好奇、羨慕、遐想、批評、甚至咒罵；儘管很少婦女願意承認自己是「摩登女子」，但「摩登女子」的教戰手冊風行一時，像《玲瓏》及《婦人畫報》均是 1930 年代相當受到女學生歡迎的刊物。[84] 抗戰爆發後，這類刊物像多數期刊一樣遭遇停刊的命運；不過孤島上海恢復秩序後，卻未見這類刊物復出。[85] 儘管時尚美容的訊息仍是婦女刊物的重點項目，但多半隱身於像《家庭》、《理想家庭》之類的刊物，似乎意味著強調女性消費主體性的期刊已不再能夠適應戰時的政治氣氛，而成爲出版的「誤區」。

其次，直至抗戰時期，主流論述仍然附和父權結構下所認可的女性角色，特別強調「母職」(motherhood)的重要性，與傳統宗族制度賦予母親尊榮地位及權力若合符節；所不同的是，前者超越姓氏界線、以抽象的「近代國家」爲權力正當性的來源，「母親」角色也被抽象化爲國家的支援者及守護者。因此即使趙洪文國從保護子女的母親轉變爲保衛國家的「游擊隊之母」，但這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性別化的權力空間 ──「兒子打頭陣，母親做後盾」的角色分工，再生產了「外庭」與「內闈」的區辨。儘管《上海婦女》刻意避免使用「母親」角色來描述趙洪文國的事蹟，但「女英雄」的論述基礎仍是男性霸權的話語，婦女必須淡化女性特質、武裝自己，方能得到認可。而「受害者」論述則更複製了帝制晚期「貞節烈女」的意識形態。換言之，戰爭時期的婦女文化仍明顯烙印著父權價值觀的痕跡。

再次，上海婦女期刊對外國婦女的報導，促使我們思考「跨國婦女

84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臺北：稻鄉，2011）。

85 最近日本學者坂元弘子也注意到，當戰爭號角一響，「摩登女子」便不再成為大眾漫畫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英勇女兵及被蹂躪的婦女。坂元弘子，〈漫畫裡的摩登女郎與抗戰〉，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2012 年 6 月 20-21 日。

文化」(transnational women's culture)存在的可能性。《上海婦女》的編輯群積極介紹蘇聯婦女的生活，便是以這些外國姐妹爲典範，冀望有朝一日中國能走上俄國共產革命的道路，中國婦女能像蘇聯婦女一樣得到解放；報導英美婦女努力抗敵的故事，則爲鼓勵婦女同胞起而傚尤。値得注意的是，編輯不僅取材自外國報刊的譯稿，也親自訪問在滬的外國婦女；更有意思的是《上海婦女》曾刊登三位女學生給日本婦女的書信，信中無非表達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心，警戒日本婦女切勿「爲虎作倀」。這三封信被轉譯發表在日文刊物的可能性並不大，顯然目標讀者應爲中國讀者；但藉著訴諸「女性同受禮教壓迫」的同理心，《上海婦女》似乎製造一種「跨國婦女社群」的公共形象，[86] 不但藉此動員婦女支持抗戰，也合理化婦女在戰爭的角色與貢獻，儘管當時這種「跨國姐妹情誼」的實踐性並不高。

最後，由於婦女文化發展於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不免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尤其是抗日宣傳爲主的期刊，主編的知識婦女認識到這是一場全面性的戰爭，「唯有」全民團結，放棄一切分化的界線（包括性別），才能度過危機。不過當「國家興亡至上」的話語進入婦女文化、甚至成爲主張女權的前提時，婦女文化開始失去五四以來所發展的「女性獨立自主」的話語力量。換言之，婦女文化成爲政治動員的工具，不必然是國家單方面的操縱，知識婦女在國家認同與女性認同之間的擺盪與抉擇，也是形塑戰時婦女文化的關鍵。

86 張惠芬、鄭悅僊、射言，〈給日本女學生的信〉，《上海婦女》，卷 4 期 3（1940 年 1 月 25 日），頁 22-23。

Women's Culture in the Shadow of the War: Women's Journals in Wartime Shanghai, 1937-1941

Ling-ling L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women's journals published in Shanghai between 1937 and 1941—the so-called "solitary island" period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the French Concession were surrounded by the Japanese occupied area due to the breakou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o examine how women's culture was constructed in the intensive wartime atmosphere. Influenced by feminist cultural theory, historians have begun to listen to women's voices, particularly noting the formation of sentiments of sisterhood cemented through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which have been interpreted as a claim of unique gender identity. While the prevailing "masculine" discour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came to shape this women's culture, its representations varied widely among different journa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women's images during the war: heroines, victims, and foreign others, to see in what ways educated women created their own culture and negotiat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ender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Key Words: women's journals, Shanghai,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eroines, sexual violence, transnational women's culture.